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本质何以被遮蔽？

——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伦理反思

吴雨柔, 吴 虹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 要

人工智能的类人能力使“人何以为人”面临新的追问。文章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根基, 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中的感性确证, 并在此视域中审视数字智能时代对象化活动、感性、劳动产品三个概念的内涵变化。技术应用方式正在系统性地重构人的自我确证条件, 其根源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支配。超越困境的路径在于将技术从对人的替代转向对人的扩展, 重建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感知自身本质的感性条件。

关键词

人工智能伦理, 人的本质, 感性确证, 异化, 马克思

How Is Human Essence Obscured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Ethical Reflection Based o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Yurou Wu, Hong W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3,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5, 2026

Abstract

The human-like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ive rise to a renewed inquiry into what makes a human being human. Taking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understands human essence as sensuous confirmation in objective

activity, and examin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conceptual changes of objective activity, sensuousness, and labor product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The mode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is systematically restructuring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self-confirmation, rooted in the domin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valorization. The path beyond this predicament lies in shifting technology from substituting for human beings to expanding their capacities, thereby reestablishing the sensuous conditions in which human beings can perceive their own essence in objective activ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Human Essence, Sensuous Confirmation, Alienation, Marx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多在应用层面为算法歧视、数据隐私等问题提供规范指引。其隐含前提即“人的尊严根基何在”等奠基性问题已被解决。但生成式 AI 产出类人式文本、图像与音乐, 算法在医疗、司法等领域替代人类判断时, 人凭借什么确证自身区别于机器的本质? 有研究者从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关系出发, 指出技术便利遮蔽了生存意义等根本关切[1], 另有研究者从元伦理学层面揭示了主流价值对齐方案所面临的理论困境[2]。这些讨论隐含一个共同追问: AI 伦理是否需要从规范制定下沉到对人的本质如何被感知和确证的反思?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从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追问人的本质何以实现, 其中人的本质力量需在感性对象化活动中被确证这一思想[3], 为分析 AI 时代的深层伦理困境提供了理论资源。本文从感性确证这一视角出发, 追问技术应用方式如何重构了人感知自身的条件。

2. 马克思异化批判的伦理学维度

2.1. 异化批判的伦理性质

西方主流伦理学各有侧重, 功利论关注行为后果, 义务论关注行为准则, 德性论关注行为者的品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伦理学进路, 它追问的是人的整个存在方式是否合乎人之为人本质。李培超在解读《手稿》伦理思想时强调, 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理解其独特价值, 而非将其视为某种不成熟的过渡性思考[4]。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道德缺陷, 不在于它造成痛苦或违反原则, 而在于它系统性地阻碍了人实现其类本质。异化劳动使工人降低为动物, 这是对一种使人无法成为人的存在方式的道德控诉。

马克思的道德批判有着完整的元哲学叙事架构。它以人的类本质假设、道德的类生活机制、道德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论述为支柱, 对道德的理念、实践与法则作出了深层分析[5]。他的异化批判揭示了工人现实的悲惨处境, 更在哲学根基处追问了“人是什么”以及“人如何实现自身本质”这些根本问题。正是这种从存在方式入手的伦理追问,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区别于其他伦理学传统的核心特质。

2.2. 感性确证

在《手稿》中,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是一个与感知经验密切相关的动态结构。他所理解的对象

性活动是感性的、实践的活动,人通过这种活动在对象中实现和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感性经验得到确证。“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6]。“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6]。

人的本质力量不是头脑中的抽象属性,而是需要在对象上被感性经验所确证。人在音乐中听出美,不仅是一种愉悦,更是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对象(音乐)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人在这面镜子中认出自身。没有这一感性确证的中介,人的本质力量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断言,无法被主体真实地体验到。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中进一步印证这一思想。“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工人本应在产品中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看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但异化使这种感知成为不可能。劳动从自由自觉活动向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发生偏离[7]。产品不但不反映工人的本质,反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站在他的对面。工人的眼睛不再是人的眼睛。他在自己亲手制造的产品中认不出自身的本质力量,在劳动过程中感受不到自由的生命活动。这是感性层面的剥夺,其伦理伤害比物质贫困更为深层。

异化在最深层意义上是一种感知的丧失,人无法在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及其成果中认出自身。当这种感性确证的途径被堵塞时,人便陷入了一种深层的存在困境:他仍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却无法在感性经验中确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

3. 数字智能时代马克思核心概念的再理解

若直接把19世纪机器大生产的概念套用于人工智能,易生理论错位之嫌。因此,有必要在数字智能语境中重新审视以下概念的理论内涵。

3.1. 从实体劳动到人机混合活动

传统对象化活动以物质生产为典型。数字智能时代,对象化活动扩展为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提示设计、内容筛选、平台交往、算法调适等数字劳动与人机混合活动。蓝江从《手稿》出发,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数据的攫取和占有,数字劳动问题并未真正脱离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视野[8]。数字劳动并非外在于马克思对象化活动理论,而是该理论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具体展开。

其核心规定并未被取消:活动须是感性的、有意识的、社会性的,人在其中设定目的、作出判断、赋予意义。若AI完全接管目的设定、判断和意义赋予,人仅余点击与消费,则活动退化为被动接受。反之,若人仍掌握问题意识、价值选择、审美判断和伦理否决,AI便只是人的延长器官,对象化活动仍可成立。因此,对象化活动在智能时代应被理解为人-技术-对象的感性实践,而非人被技术替代的过程。

3.2. 从肉身感官到界面化感性

马克思强调感官的人化。数字智能时代,感性不再限于五官直接接触,还包括界面感知、数据感知、算法感知。王敏、胡钰以马克思“感性是一个媒介”的论断为核心,指出数字媒介接管了人的感官、感知能力和意识,带来时空感知的混乱,直接影响人的思辨和创新能力[9]。张兵、张雨蝶进一步提出数智时代存在微粒化生存与界面化认知两种感性异化形态[10],主张在对象性维度重塑实践主体性、在非对象性维度重建本真共同感。

感性确证在数字智能时代面临新的条件变化。重新审视感性概念,关键不在于否认界面经验,在于

坚持感性确证的三个条件：可体验、可反思、可归因。可体验，意味着人能在对象中感到愉悦、困难、创造与承认；可反思，意味着人能理解自身在活动中的位置；可归因，意味着人能把成果与自身贡献联系起来。若界面只提供即时满足，却切断反思与归因，感性便从确证力量退化为被动刺激。

3.3. 从物性成果到数字对象

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产品包括文本、图像、代码、数据、模型输出及混合创作。有研究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出发，将数智劳动能力分析为人类认知能力、创造能力和协作能力的对象化，认为数智劳动全面拓展了劳动的对象、工具和成果[11]。这一判断为理解数字对象的理论定位提供了依据。

产品要成为人的本质力量镜子，需满足可认领、可修改、可解释、可分享四个条件。可认领，指人能确认自身贡献；可修改，指产品向人的再创造开放；可解释，指生成过程不被完全隐藏；可分享，指产品进入社会承认网络。若产品由算法黑箱自动生成、平台占有、用户仅消费，它便不再承载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也难以成为感性确证的媒介。由此，马克思的劳动产品概念应从物性商品扩展为承载人的感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数字对象。

4. 人工智能时代伦理困境的三重维度

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条件下，人在感性经验层面逐渐丧失了在对对象世界中认出自身本质力量的可能。

4.1. 生产维度

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产品中，产品因而成为人直观自身的感性对象。人工智能的介入系统性地改变了这一结构。当语言模型可以在数秒内生成文字，当图像可以由模型根据提示词自动绘制，产品不再携带人的构思、技艺与判断，其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关系便被切断，因而也不再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发挥作用。

冯月季指出，当智能算法上升为权力话语时，人类主体的符号域趋于物化，主体意识被算法逻辑所囚禁，丧失了探索意义世界的元符号能力[12]。人从意义世界的主动建构者退居为算法输出的被动接受者，失去了在对象化活动中主动赋予意义、建构符号的能力。楼庭坚从技术机制层面推进分析：生成式 AI 的过程隐藏在系统性消解人的反思距离。传统创作中的构思与试错过程本是主体性的塑造场所，而 AI 绕过这一环节直接交付结果，人便被免除了塑造主体性所必需的智识磨砺[13]。大卸载最终导向空洞自我。冯连军指出，人工智能条件下活劳动主体性的危机，是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深度共谋之下对人劳动本质的系统性遮蔽与结构性消解[14]。AI 对生产活动的替代所引发的伦理困境的要害在于对象化活动本身被技术逻辑所重构。人在这一活动中感知和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条件，由此趋于瓦解。

4.2. 意识维度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意识的确证并非纯粹的内在事件。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象上被认出时才成为现实的。语言产品正是这样一种感性对象：人在自己书写的文字中认出了自己的思想，由此获得我在思考的感性证据。

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确证结构。当 AI 能够生成结构严谨的文本时，语言产品作为意识的外在标记的功能便动摇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AI 是否真的在思考，而是人无法再通过自己的语言产品来确证自身的思维能力。它迫使自我确证从感性对象性维度退回到纯粹的内在性维度。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人的本质力量必须通过对象化活动来确证，意识的确证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当语言产品不再能够充当意识的外在标记时，人便丧失了一种根本性的自我感知途径——不是思考能力本身，而是在感性世

界中感知自己思考的条件丧失了。从感性确证退缩到只能在内心确信自己的意识, 人对自身意识的确信失去了感性根基, 从而构成一种比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更为深层的伦理困境, 它触及的是人感知自身本质力量的途径本身是否依然通畅。

4.3. 交往维度

马克思将社会性纳入人的本质规定。人是类存在物,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证自身。他人的目光、回应与期待构成了一面社会性的镜子, 人在其中感知到自己被承认、被需要, 从而获得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实在性。这个确证机制的核心在于: 镜子中反射的是一个独立主体的真实回应, 而非自身的回声。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普及使其性质发生了改变。刘华指出, 人工智能从决策代理、创造力模糊和社会互动模式重构三个维度动摇着人类主体的核心特征, 其中社会互动模式的重构最为隐蔽, 因为在社会互动中, 人最直接地感知到自己是人[15]。与 AI 的对话在形式上维持了交流的外观, 但对话的另一端没有意图、没有期待、没有与人共属的世界。AI 的输出是概率分布的结果, 不包含对用户的意向性指向。人面对的只是一面平的镜子, 人自身投射的东西被原样折返, 社会性的镜子被替换, 人逐渐丧失在真实社会关系中感知自身的能力。当社会性的确证途径被堵塞, 人在类存在意义上的自我感知便失去了感性的落脚点。

这三个维度都不涉及人工智能对人的具体伤害, 而是指向人工智能如何系统性地改变人感知自身存在方式的条件。在马克思的伦理视域中, 一种存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 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些外在规范, 而在于它是否允许人感知和实现自身的本质。当人工智能以替代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方式嵌入人类社会时, 它便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它在人最需要确证自身本质的领域, 堵塞了感知的通道。

5. 困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这些表现并非技术演进的自然后果, 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塑造技术使用方式的产物。需要进一步追溯这一困境的社会根源, 并阐明其与 19 世纪劳动异化的历史连续性。

5.1. 资本逻辑对对象化活动的改造与替代

对象化活动从确证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生命活动转变为可替代的生产环节, 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劳动过程的系统改造。李桂花、宋田光指出, 工具向机器的转化意味着劳动过程主导权从劳动者向资本的历史性转移, 劳动者的技能与判断被分解、编码进机器体系, 劳动者成为无意识的器官, 对象化活动由此被改造为可控制的生产要素[16]。这一改造在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新的矛盾: 技术本应增强人的能力, 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成为排挤与遮蔽人自身的异己力量。张灿将这一矛盾概括为人机悖论, 在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统摄下, 人机关系呈现出监控剥削、机器偏见等新型悖论样态, 人工智能技术在极大增强人类能力的同时, 也造成了人与机器的深层对立与社会政治伦理的失序[17]。然而, 这一对立并非以直接对抗的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呈现。黄再胜揭示了运作机制: 大模型生产下的人机协作表面上死劳动不再支配活劳动, 促进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再人性化, 实则数字资本操控下加速了知识工人技能贬值, 长此以往将侵蚀人类复杂认知能力生成的实践基础,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趋于边缘化[18]。张旭、张彦泽进一步指出, 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会导致“数字异化”与“解放矛盾”[19]。在这个意义上, 人工智能时代异化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 而在于技术的占有与使用方式[20]。由此, 产品由算法生成、决策由模型作出时, 对象不再承载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 感性确证的途径发生结构性断裂。

5.2. 与 19 世纪异化的历史连续性

当代困境并非对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的否定, 而是其历史深化。数字异化的本质仍然是机器体系所

引发的劳动与资本关系问题[21]。借鉴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审视当前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能够揭示其中存在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和资本逻辑宰制[22]。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求持续将人从对象化活动中排挤出去。

罗克全、李雪柯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实质是资本逻辑的延续,马克思揭示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形态[23]。更为隐蔽的是,平台通过游戏化劳动机制将绩效指标内化为劳动者的价值准则,使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升级为“代码捕获意识”的认知剥削[24]。19世纪机器体系对工人的规训主要发生在体力层面,而当代算法体系对人的替代已推进到认知和主体性层面,被剥夺的不再仅是劳动产品,更是在劳动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可能性本身。

19世纪的异化中劳动从自由变为强制,但劳动过程本身仍由劳动者执行;当代困境中人不仅不拥有产品,更在产品生成的判断、决策与创造环节中被系统性地替代,即使在场,其活动也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化活动。19世纪的异化以显性的痛苦经验呈现,工人在疲惫与贫困中直接体验异化带来的不幸;当代困境则包裹在技术便利的外壳之下,将人悄然逐出对象化活动的核心环节。正是这种从显性到隐蔽、从扭曲到掏空的演变,使马克思的异化批判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理论穿透力。

6. 超越困境的伦理路径

当人工智能机器具有能够满足产品生产所需的智能性因素,能够代替生产工人成为活劳动的承担者时[25],人还能否通过对象化活动来确证自身的力量?困境的核心在于感知自身本质力量的条件是否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是在伦理反思的层面上追问超越这种异化的可能路径,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原则。

6.1. 追问作为抵抗

当代困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呈现为显性的痛苦。19世纪工人显性的痛苦经验本身就包含反抗的可能。然而,当AI生成的内容以便利和丰富的面貌涌入日常生活时,人在感性经验层面的丧失被掩盖在技术乐观主义的表象之下。人被逐出了对象化活动的核心环节,却可能因消费AI产品的便捷而感到满足。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他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本质上是将工人日常经验中隐约感到却未能言明的不适上升为理论层面的明确诊断。早期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具有深刻的元哲学叙事架构,它不仅揭露现象,更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5]。本文从感性确证的理论奠基,到三重表现的诊断,再到社会根源的追溯,进行的全部论证就是对困境的抵抗。在追问和揭示中,被遮蔽的东西重新进入了人的意识。意识到“便利”背后可能存在的丧失,是超越困境的第一步。

6.2. 从替代到扩展

困境的机制在于人工智能对对象化活动的替代,出路的第二个层面便指向这一机制的扭转。阎孟伟指出人工智能替代活劳动并不必然导致人的处境恶化,关键在于替代所释放的自由时间能否得到公平的分配和有意义地使用[25]。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伦理后果。超越困境的路径在于改变人工智能嵌入人类社会的基本方式,从替代转向扩展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可能性。

Sadek与Mougenot基于对30位AI从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价值敏感设计在实践中面临两类核心障碍:一是因用户群体不确定性和跨学科专业知识缺乏而难以识别和纳入利益相关者;二是因实践复杂性、责任归属不清和支持不足而难以将价值观整合到技术方案之中[26]。这一发现从反面提示,若缺少一个明确的规范性基准,设计实践容易在效率逻辑的挤压下偏向替代方向。将“是否有助于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感知和实现自身本质”确立为设计尺度,正是为扩展方向提供这样的基准。就具体设计而言,这意味着在目的设定与判断环节保留人的否决权与修改权,在生成过程上保持可解释性与反思距离,在成

果归属上支持贡献的记录与署名,在交往活动中标明 AI 的非人身份并促进真实人际互动。这些方向正是扩展这一伦理转向在产品设计层面的具体落实。

6.3. 恢复感觉的解放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共产主义的实现与感觉的解放直接关联,这一思想指向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重新分配,更是一场感性经验的革命,让眼睛能够在对象上认出属人的内容,让耳朵能够听出属人的意义。将这一理想投射到人工智能问题上,超越困境的最终方向便清晰可见,不是让人适应机器的节奏,而是让机器服务于人的感性解放。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更是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王保民、武朝阳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角度指出,用法律规制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用方式,用法的价值约束引导人性欲望[27]。李亚明则从元伦理学层面提出了从价值对齐转向理由对齐的替代性思路,主张通过理由来解释道德上的正确,进而以正确来解释价值,从而为价值提供可分析的解释,在道德判断中容纳义务,并论证行为本身的价值[2]。两种进路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原则:守护人感知自身本质的感性条件不被技术逻辑所侵蚀。让技术从遮蔽人的本质力量的力量,转变为扩展人的感性丰富性的条件——这正是马克思感觉的解放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要求。

7. 结语

人工智能对“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的挑战,实质在于它是否在重构人感知自身的条件。当对象化活动被资本逻辑改造与替代,人在感性经验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通道便趋于堵塞。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技术所置身的社会关系。超越此种困境的方向,是守护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感知与实现自身本质的感性条件。马克思“感觉的解放”这一命题,为人工智能伦理提供了比制定规范更为根本的追问方式:它追问的不是技术应当遵守什么规则,而是人如何在技术中介的世界中依然能够认出自身。

参考文献

- [1] 李微, 张荣军. 价值理性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及其伦理边界[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3-20.
- [2] 李亚明. “价值对齐”还是“理由对齐”?——人工智能伦理设计的元伦理学反思[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5, 27(3): 1-9.
- [3] 张海燕.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伦理学革命意蕴[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4): 170-177.
- [4] 李培超. 解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伦理思想的应有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38(6): 15-20.
- [5] 胡潇, 黄梅玲. 早期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元哲学叙事——基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J]. 伦理学研究, 2013(2): 8-13.
- [6]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7] 颜岩, 姚航斌. 论马克思“劳动本质”思想的辩证法意蕴——基于对“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统一性的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6): 162-168.
- [8] 蓝江.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批判——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当代数字劳动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8(5): 1-10.
- [9] 王敏, 胡钰. “感性是一个媒介”: 数字媒介感知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 32(8): 35-47+126-127.
- [10] 张兵, 张雨蝶. 马克思感性批判的当代重构——以“类”与“共同感”的辩证关系为枢纽[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1(3): 1-10.
- [11] 钟平玉, 齐磊磊. 数智劳动的能力、本质与影响——基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的分析[J]. 经济学家, 2024(12): 25-33.
- [12] 冯月季. 符号学视角下智能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反思[J]. 东南学术, 2022(5): 51-59.

-
- [13] 楼庭坚. AI 时代的“大卸载”: 超越的迷思与主体性的终结[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6, 47(1): 59-66.
- [14] 冯连军. 人工智能条件下“活劳动”主体性的危机与重构[J]. 社会主义研究, 2026(1): 35-44.
- [15] 刘华. AI“主体”: 人工智能对人类自我的挑战与重塑[J]. 民族学刊, 2025, 16(8): 67-75+159.
- [16] 李桂花, 宋田光. 机器集置、劳动规训与自由图景: 《资本论》机器思想研究的新维度[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1): 22-30.
- [17] 张灿.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人机悖论及其应对[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5): 33-42.
- [18] 黄再胜. 大模型生产下的人机协作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J]. 国外理论动态, 2025(2): 79-90.
- [19] 张旭, 张彦泽. GPT 系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4): 122-131.
- [20] 侯彭振, 杨宏伟.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探析[J]. 理论探索, 2026(1): 43-51.
- [21] 王洁钰, 高奇. 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数字异化的根源分析与消解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9): 73-81.
- [22] 谢晓娟, 张成相. 数字劳动的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当代反思[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6): 1-8.
- [23] 罗克全, 李雪柯. 重思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于《巴黎手稿》的文本考察[J]. 科学社会主义, 2025(6): 56-63.
- [24] 陈艳波, 张乾. 从算法权力到算法拜物教: 数字劳动异化的生成及扬弃[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43(4): 141-150.
- [25] 阎孟伟. 活劳动、人工智能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J]. 求是学刊, 2025, 52(1): 18-28+187.
- [26] Sadek, M. and Mougnot, C. (2024) Challenges in Value-Sensitive AI Design: Insights from AI Practitioner Intervie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41**, 10877-10894.
<https://doi.org/10.1080/10447318.2024.2439021>
- [27] 王保民, 武朝阳.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6(4): 31-40.